

席勒的时间关切与德意志民族文化认同建构

盛百卉*

丹尼尔·罗什认为：“时间性 (temporalité) 是错综复杂的，这一点是我们理解 18 世纪的一个基本原则。”^{〔1〕} 在新旧交替的启蒙时代，每个思想家都不可避免或显或隐地思考时间问题。每种时间观念、信仰背后都有着进步论或退步论的深层背景。受前辈“古今之争”的影响，席勒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与其建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理想联系在一起。

席勒最早以文字的方式关注时间是在 22 岁时，他在一首诗中发出了追问。

他们轻轻地互问，惴惴不安：
难道就这样没完没了？——
永恒在他们上空循环周转
打断了萨图尔努斯的镰刀。^{〔2〕}

年轻的诗人自此开始把“时间”纳入思考，他早期对于时间的理解具有典型的神话思维特点，即充满拟人化生动的形象感。诗中提到的萨图尔努斯 (Saturn) 是古罗马神祇，他通常以手持镰刀的老人形象出现。据说他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时间之神克罗诺斯，克罗诺斯被儿子宙斯推翻后来到意大利，成为农神和时间之神的混合体。他掌管农事与季节轮换，“为了纪念他的统治，在意大利，每年冬天都要举行农神节 (Saturnalia)。”^{〔3〕} 在这首小诗中，一群来自地狱的灵魂怀着忧惧向上注视，他们悲哀地发现萨图尔努斯掌管的季节轮回要居于“永恒”之下。可见，自青年时代起，席勒脑海中就隐隐出现了“永恒”与“短暂浮生”的二元对立。他将“永恒”摆在最高位置，而人类活动则居于次要位置。在之后的美学建构、文学创作中，他始终保持了“永恒”和“短暂”之间的等级，即使他曾用大部分时间以戏剧展现生生死死的尘世，但亦用“人格”^{〔4〕}、“美”、“理想”等概念来对应开初的“永恒”。

在岁月流逝中，哲学头脑、诗性敏感和民族情怀使席勒对时间问题的思考渐趋复杂，人类存在的自然性和文化性使他逐步形成了兼具科学的时间观、诗人的时间观、哲学家的时间观于一体的多重时间信仰。本文着重探讨席勒头脑中的“科学的时间观”和“诗人的时间观”。

* 盛百卉 (1978—)，女，吉林长春人，文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论研究。

〔1〕 丹尼尔·罗什：《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杨亚平、赵静利、尹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8 页。

〔2〕 席勒：《来自地狱的一群》(1781 年)，见《席勒文集·I》，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 页。

〔3〕 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北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7 页。

〔4〕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人格”与“状态”的二分法。“人格”代表人身上不变的部分，“状态”代表人身上不断变化的部分。

一、科学的时间观

在本文中,“科学的时间观”指的是伴随现代化展开而被确信的线性时间观念。它是一种物理时间,脱胎于奥古斯丁的论证,但被系统研究却是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后。线性时间犹如射出的利箭,一去不回,永恒向前。被现代化进程裹挟的席勒敏感地意识到人类社会中线性时间的存在。在他享年不高的一生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流逝感贯穿他诗歌创作始终。

我看到时间向你的岸边飞逝,
抛下灿烂的自然^[5]

时间的步伐有三种不同:

姗姗来迟的乃是未来,
疾如飞矢的乃是现在,
过去却永远静止不动。^[6]

在上述诗句中,席勒点明了线性时间流逝的特点:它匆匆向前、奔腾而去,不会为任何人事稍作停留。在永远向前的线性时间面前,人类不禁慨叹青春易老、韶华易逝。如果席勒对于时间的感受仅停留在叹息层面,那他就没有超越前辈诗人。席勒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在“现象”中昭示“规律”,在“短暂”中寻求“永恒”。他从不满足于人在时间中“有限”的存在,他要超越时间,获得“无限”。25岁的他就已经开始将浮生“享乐”与精神“信仰”分列在不同等级。“有两种花在开放, / 专供那些聪明的发现者欣赏, / 它们叫做希望和享乐。// 如果摘下二者中的一枝花, / 另一支就得放弃。 / 不能信者,就享乐。这句古话 / 像世界一样永久。能信者,克制吧! / 最后审判总结一部世界史。// 你有了希望,酬劳已付给了你,信仰就是实现了的幸福。”^[7] 这些诗句表明,如果个体在短暂有限的存在中追求价值、意义和信仰,那么即使肉体陨灭,精神依然长存。席勒的这种理想,在经过康德哲学和法国大革命洗礼后愈加成熟,这集中体现在1799年的《大钟歌》中。

《大钟歌》不仅影响深远,而且题材很有趣味,在席勒生前身后,将钟作为诗歌主题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笔者认为,席勒借由“钟表”找到了当时欧洲人生活的鲜明象征。“西洋人一生中跟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诞生以后举行洗礼时要敲钟,举行婚礼时要敲钟,灾祸降临时要敲钟,祈祷时要敲钟,举行葬礼时也要敲钟。”^[8] 大钟的身影遍布中世纪的教堂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市镇。大钟是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一体化的意象,每天二十四下固定报时,同时每一天的循环又融为永恒向前时间长河中的一点。时间本身虽然没有情感,但人世沧桑却离不开时间的参与,钟声、人生难分难舍地交织在一起,这也构成了诗中两条行进的线索:一条是钟场从融铜、加锡、浇铸、冷却、碎模到吊钟的全过程;一条是市民从生到死、勤劳操持、充满世俗气息的一生。从第一级符号系统看,席勒用制钟的过程来形容人生;从第二级符号系统看,本诗深层所指是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市民生活与现代性的时间意象联系在一起。

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钟虽具物质形式,但它是远离太阳、土地之后的抽象。远离了田园牧

[5] 席勒:《忍从》(1784年),见《席勒文集·I》,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6] 席勒:《孔夫子的箴言》(1795年),见《席勒文集·I》,第51页。

[7] 席勒:《忍从》(1784年),见《席勒文集·I》,第29页。

[8] 席勒:《席勒诗选·前言》,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歌的现代人,“肚皮再也不是自己的日晷”,大钟会“每小时一次将时间轻叩”^[9],由时钟代表的线性时间切割、规划人伦日用。在大钟表征的时间中,世间一切仿佛有条不紊,但早已失去神圣。自然、信仰、德性、崇高等古典价值与现代人渐行渐远,所以席勒才会感慨人生戏剧变化无定。

席勒并不满足浮生被线性时间裹挟,他有自青年时代起就从心里生长出的“永恒”意识。尽管线性时间冰冷、没有同情心,但他仍试图将其与“永恒”连结在一起。他设想大钟:“悬在蔚蓝的天庭, / 高临下方的尘俗世界, / 跟天上的雷电为邻, / 接近辉耀的繁星世界, / 它将成为天上的声音, / 就像明星在运转不歇, / 赞美它们的创造之神, / 引导头戴花冠的季节。……让它升入音响的王国, / 把它高举到太空之中! ……让它第一次发出的声音, / 标志本市的欢乐与和平。”^[10]在席勒的诗性想象中,大钟超越了现代化进程中线性时间的冷硬,它与“雷电”、“繁星”为邻,接受了上天神圣的意旨。它的每一次敲击都引世人注视头上的星空与内心永恒的道德,它应承载世人的渴望与幸福、传递“欢乐与和平”。也正因如此,席勒才在诗歌起首为大钟定下神圣的基调,他引用瑞士夏芙豪森市大教堂内的钟铭:“我呼唤生者, / 我悲悼死者, / 我击碎雷霆。”^[11]

二、诗人的时间观

尽管席勒头脑中具有现代化以来伴生的线性时间观念,但诗人的敏感使他对时间的理解别具一格。

席勒曾创作两首诗集中谈到希腊诸神帮助人类创造、发展社会文明的历程。历史应是对真实事件的叙述,但在各民族的童年,神话都曾被视作历史,科林伍德称之为“准历史学”。神话中的“陈述并不是对问题的答案,不是研究成果,而仅仅是述说作者已经知道的东西”^[12],所记录的不是人类的活动而是神明的活动。席勒所处的18世纪,人们已经对历史作区别于数学、科学或神学的独立思考,即“历史学已开始被当作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13]他在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学渐趋主流的时代又回到神话,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意味的问题。

为什么经历了启蒙时代自然科学、乐观进步论、线性时间观念洗礼的席勒,仍然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诗性地归于古希腊神祇?

笔者认为,席勒的时间观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经受法国大革命及康德哲学洗礼之后。1795年,席勒在《时序女神》一、二、六期上发表了《审美教育书简》,在杂志十一、十二期和1796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一方面,他以这两部著作表达其对时间的哲学看法;另一方面,他在诗歌创作中仿照古希腊诗人的方法记述历史,这既是向荷马、赫西俄德致敬,也是从古典文化中寻求资源对抗社会现代性的大胆尝试。此时,德国启蒙运动的诗人维兰德和“古今之争”中温克尔曼对他的影响爆发式地显现出来,席勒沉浸于对古希腊灿烂文化及奥林波斯山上诸神的遥远想象,建构着属于诗人眼中的时间和历史。

席勒曾创作过两首以神话为题材叙述人类历史进程的诗:《散步》(1795)和《厄琉西斯的祭奠》(1798)。笔者认为,虽然创作时间上《散步》在前,《厄琉西斯的祭奠》在后。但在内容上,《厄琉

[9] 席勒:《大钟歌》(1799年),见《席勒文集·I》,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10] 席勒:《大钟歌》(1799年),见《席勒文集·I》,第141—142页。

[11] 同上,第124页。

[12]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3页。

[13] 同上,第32页。

西斯的祭奠》可以看作是《散步》的前传。《厄琉西斯的祭奠》建构的是五谷女神墨忒耳自青铜时代之后帮助人类从蒙昧走向古希腊城邦文明的历史。而《散步》建构的则是从古希腊城邦文明、历经中世纪、截止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两首诗在内容上前后相继。

在《厄琉西斯的祭奠》中,席勒脑海中的历史是艺术化的叙事故事。他歌颂了五谷女神号召诸神帮助人类建构文明社会的丰功伟绩。

用金色麦穗把花环编好,
蓝色矢车菊也不可遗忘!
欢乐会使人眉开眼笑,
因为驾临了我们的女王,
她矫正了野蛮的遗风,
她使人和人互相交往,
她把迁徙无定的帐篷
化为平安的定居的住房。^[14]

诗中的“女王”就是五谷女神墨忒耳,又称刻瑞斯。她是克罗诺斯和众神之母蕾娅的女儿、宙斯的妹妹。对于后世的研究者,她仿佛具有特别的引力。黑格尔在《美学》第二卷中多次提到她。第一次是在“不自觉的象征”中将五谷女神和她的女儿作为死亡与再生的象征。第二次是在“古典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将她与普罗米修斯对比,解释为什么将她归到“新神”^[15]行列。第三次是以祭祀谷神的神秘仪式来说明被否定的旧神因素如何以肯定的方式保留在新神体系里。第四次是将其作为例证来说明新神的身上仍具有自然因素,“五谷女神色列斯也是以自然繁殖为出发点,后来才有精神的内容参加进去,这种关系是从农业和财产之类概念发展出来的。”^[16]

据神话记载,墨忒耳主管与农业有关的播种、收割和丰收庆典。她的女儿被冥王抢去后,她寻遍大地,最后在宙斯的调解下冥王准她的女儿阳世居住半年,阴间居住半年。也因为其女是冥后,所以她跟天国的各种仪式以及冥府的各种典礼都有关系。席勒曾用《五谷女神的悲叹》^[17](1796)讲述过这个令人心碎的神话。诗中的厄琉西斯(Eleusis)是墨忒耳寻找爱女时途经之处,在这里,她受到国王刻瑞俄斯的热情关照,为表感激她向王子传授农耕技术。后人立神庙祭祀这位女神并每年举行神秘的庆典仪式。“在这些仪式上,一个个‘演员’相继出场,表示生与死的自然交替,也预示复活和不朽。在献给农业女神和冥后的圣物中,属于植物的有成捆的谷物和具有催眠作用的罂粟,属于动物的有母牛、绵羊和猪。”^[18]谷物、猪牛羊这些祭品带有明显的农业文明特征。

在诗中,席勒想象原始人穴居、靠狩猎为生,他们孤独、粗野、短命。“怯生生的穴居之人, / 他们躲进了深山穷谷; / ……猎人拿着投枪和弓箭, / 在各个地方奔波流浪”。墨忒耳同情人类的境

[14] 席勒:《厄琉西斯的祭奠》(1798年),见《席勒文集·I》,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0页。

[15] 《美学》中的谷神色列斯就是《厄琉西斯的祭奠》中的五谷女神墨忒耳,又称刻瑞斯。在对待人类文明史的问题上,黑格尔具有唯物主义的视角。他认为人类首先必须满足物质的直接需要,之后才能进入政治生活或精神生活。根据这个标准,“旧神”只是仅涉及自然力量的神,“新神”是指涉及社会生活的。五谷女神是个特例,他认为刻瑞斯既涉及自然力量又涉及社会生活,但还是将其列入新神行列。

[16] 同上,第217页。

[17] 席勒:《五谷女神的悲叹》(1796年),见《席勒文集·I》,第104—111页。席勒用五谷女神培养植物(根在地下,花在阳世)象征母女间的爱,并将死亡和生命联系起来。

[18] 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北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9页。

遇,为他们的堕落感到痛苦,她发誓要帮助人类成为真正的人,让他们与大地母亲建立“永远的盟契”,这意味着用“农耕文明”取代“采集狩猎文明”,建立人与土地生死相依的紧密联系。“她从猎人粗鲁的手里, / 把沉重的投枪拿走, / 她就用这长柄的凶器 / 将轻松的土掘出垄沟。 / 她又从花冠顶上 / 拿一颗充满生力的种子, / 向松软的土缝中安放, / 它就膨胀而抽芽生枝。”墨忒耳收割第一束禾苗献给宙斯,宙斯悦纳后引发碧空雷鸣、电光闪闪、烈火熊熊。席勒描绘原始人野性的灵魂受到感化,他们“第一次有了人性的感情”。“抛掉血腥的武器,打开蒙昧闭塞的心扉”,虔诚地向女神学习农耕技术。希腊群神也在墨忒耳的感召下纷纷下凡:忒秘斯送来法律和正义;赫淮斯托斯送来锻冶术;密涅瓦为人类建造城市,众神都来帮忙,阿耳忒弥斯砍伐木材、河神运送木排、时间女神雕刻圆柱、海神制造花岗岩石柱、赫尔墨斯堆砌城墙、阿波罗和缪斯用音乐感化顽石自动结合、库柏勒安装门窗。在众神的帮助下,原始人走出洞穴,住进宏伟的城邦。赫拉作为婚姻之神,“领着最美丽的牧人 / 到最美的牧姑面前”。“一切天神都来贺礼, / 祝贺结缡的新郎新娘。”席勒想象在人类的文明制度中,由群婚制、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也来自于神的安排。

笔者注意到,在席勒笔下,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进化缺乏线性时间维度。虽然席勒在诗中点明人类有一个从采集—狩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发展过程,且这个文明阶梯已接近今人共识,但他用诸神瞬间的神力取代了人类漫长的进化过程。如此一来,突变就取代了渐变,仿佛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在时间的某个点上一蹴而就。席勒军医出身,受过科学洗礼,他并不愚昧,但为什么还要如此描述历史呢?笔者认为,这代表了席勒头脑中一种“文化时间”观念。

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文化时间”的出现早于“科学时间”,而在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后,“文化时间”又体现为主体基于各种意图对“科学时间”的背离及变形处理。席勒头脑中并不缺乏线性的科学时间意识,但在德意志民族文化建构的过程中,他却有强烈地“向后看”意识。在那个科学兴起、神话衰落的启蒙时代,他比前辈先一步预感到理性无节制扩展的危险。尽管科学用正、负电子摩擦取代了宙斯这个雷神,但它还是肤浅的。科学无法解释人类精神生活中那个广阔、深沉、神圣的未知领域,所以席勒才会将古希腊诸神推到台前。他试图提醒现代人不要忘记在遥远的过去同诸神的种种联系,那时的人对自然、神祇心存敬畏,也因这份敬畏才逐步发展起道德、伦理。

野兽在荒野自由来往,
神在太空中自由统治,
他们胸中的强烈的欲望,
都受自然法则的控制;
人处于他们二者之中,
应该团结成天下一家,
只有通过道德之功,
才使他们自由而强大。^[19]

在这些诗句中,仿佛能够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城邦之外非神即兽”。人处于“野兽”和“神”之间,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恪尽道德义务才能够“自由而强大”。席勒一方面哀叹现代人在祛魅过程中与维系共同生活最有益的德性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也清楚地意识到历史进程的不可逆性。“宙斯已经

[19] 席勒:《厄琉西斯的祭奠》(1798年),见《席勒文集·I》,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240页。

被推翻,再也不能成为思想的最初前提了。”^[20]无论个体多么顾盼与向往,那个天、地、人、神混整存在的时代,那个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尚未分离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回,也因回不去才会有诗的感伤。席勒的古希腊“家园情结”并不是孤立的,纵观德国启蒙时代,有一大批思想家在意识或潜意识层面不断述说着“向后看”的文化渴望。

在诗歌《散步》中,席勒则描绘了一个“散步者”的形象。1795年正是他写作《审美教育书简》期间,严肃的哲学思考并不轻松,他需要不时走出书斋,在自然中释放诗性的敏感。

祝福你,我的山,你那红光映照的峰顶!
祝福你,和蔼地照耀山峰的太阳!
祝福你,苏醒的原野,你们,沙沙的菩提树,
在树枝上面摇晃的快乐的鸣禽,
还有你,平静的蓝天,你倾泻下无限的天光,
笼罩着褐色的群山、碧绿的森林,
也笼罩住我,我终于逃出书斋的牢笼,
狭隘的清淡,欣然逃到你这里。
你那四溢的香气沁入我的心脾,
强烈的明光使我眼目清新。
繁盛的原野闪耀着千变万化的色彩,
斗艳争妍,却融成优美的一体。^[21]

在诗的起首,“我”漫步于天光云影下的德意志群山和森林。诗中不断出现的意象,诸如太阳、树木、溪流、季节……都是自然时间的隐喻,读者能够明显体会出席勒对于大自然的崇拜。在之后的叙述中,席勒将文明更迭的漫长线性时间诗性地凝缩成瞬间,他两次用到“突然”这个字眼。“农舍”和“城市”成为不同文明阶段的象征。

第一次是,“可是,帷幕突然揭起。敞开的森林/出其不意地送回炫目的昼光”。“可是,在这永恒的高空深谷之间,/有一条装着栏杆的安全的小路,/丰饶的河岸从我的身边含笑地溜过,绚烂的山谷炫耀着愉快的劳动。/瞧那些划分农民田产的一条条界限,/是五谷女神编织成原野的地毯”。在这里,五谷女神墨忒耳首先出现,席勒称她为“维护人类的女神”。在她引领人类用农业文明取代了采集—狩猎文明之后,人类的农舍“跟田亩和睦地聚居在一起”、幸福的乡民“还不懂得争取自由”,他们“欣然跟田野共守狭隘的旧规”,在“循环安稳的收获”和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消磨浮生,他们崇拜的是古希腊的自然神。

第二次是,“可是,谁突然劫走这种美景?异样的/精神迅速弥漫于异样的原野”。当森林被城市占据,人类活动与自然形成对立,人类文明发展出规划和等级,“在农村里树木、田野、牧场、菜园都亲密无间地混杂在一起。在城市里却同类相聚。田亩、树木、花园都各自分离。”^[22]中世纪“从岩石中兴起了巍然的城市”,自然神、多神论及女神论(当然也包括“五谷女神”墨忒耳)纷纷衰落,基督教一神论成为统一信仰,“林中的羊人受排挤,被赶进荒野,宗教/虔诚却赋予石头更高的生命”。基于这些诗句中进行的分析,席勒认为,在文明更迭的过程中,“外部世界”的变化并没有使人的“内部世界”变得更加幸福。他在诗中影射了十字军东征和宗教战争的历史。宗教不宽容引发了基督教

[20] 卡尔·贝克尔:《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21] 席勒:《散步》(1795年),见《席勒文集·I》,张玉书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22] 同上,第78页。

和伊斯兰教之间、基督教内部长期血腥的战争，所以才导致“活动更频繁，内心世界更不宁”。不同人群根深蒂固的成见使得“火热的斗争发挥出钢铁般的力量”，争论各方都视自己为正统、视他者为异端。面对人类不宽容的宗教文化历史，席勒认为“竞争的成效很大”但“团结更生效”，现代社会急需摒弃不宽容重新寻找一种使人产生“共通感”的资源。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古希腊，那里有着欧洲人共同的祖先。

席勒继而又描绘了宗教衰落、科学兴起之后的人类历史，“科学消散了妄想的迷雾”，隐退了中世纪的黑暗，但是，人类在粉碎了迷信与无知的枷锁的同时也释放了自己的欲望，他们“扯断了羞耻的缰绳”，信仰、公序良俗荡然无存，“直到危机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成为人类消极自由泛滥的真实写照，“人类燃烧着犯罪、苦难的怒火站起来”，他们在寻找出路，“啊，城墙，打开吧，让这些囚徒获得自由！ / 让他们逃生，回到被抛弃的原野”！在全诗的最后部分，“原野”的意象与自然、古希腊融为一体，成为人类的终极救赎之地。

笔者认为，席勒用诗歌的方式将读者的目光引向古希腊和自然，以神话记述历史昭示出其对以线性时间为主流的现代性时间观念的严肃批判。在乐观线性历史进步论喧嚣日上的18世纪，他敏感地意识到启蒙与现代化的内在矛盾，启蒙不仅是精英层面的启蒙，更应该成为普通大众的启蒙；现代化不仅是政治、经济层面的社会现代化，更应成为人精神层面的现代化。科技、经济、政治层面的发展也许遵循向上的线性轨迹，但人类道德水平的演进却不应盲目乐观。事实证明，西方自启蒙以来，在传统价值体系衰落后，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崭新的价值体系重新矗立起来，伴随着现代资本运作体系产生的是一种无比强烈的物质需求。当系统领域内金钱最大化、权力最大化成为全社会追逐的目标时，美好德行、高尚趣味与现代人渐行渐远。由此，现代人进入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但却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尽善尽美的虚无主义时代。

三、结语

面对“科学的时间观”和“诗人的时间观”之间的冲突，席勒试图用哲学书写的方式予以调和，在《审美教育书简》、《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等哲学著作中，他不仅分析了十八世纪德国的社会状态，更呼应时代吁求，由文学、美育研究入手迂回表达潜在的政治哲学观念，系统阐释为什么德意志需走上一条文化现代化优于社会现代化的独特转型路径，并倡导文化现代化与政治、经济现代化同步发展，用文化形塑起精神层面真正丰满、幸福的现代人。席勒的思路今天依然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如何使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与大多数人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同步？如何从自然、遥远的过去以及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资源助力当下的现代化转型？这是值得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穷毕生精力研究的重要课题。